

中国共产党早期
革命家的故事

之七



杜世伟

陈延年的故事
陈乔年的故事
阮啸仙的故事
熊 雄的故事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的故事

(之 七)

杜 世 伟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 · 北京

主 编 石仲泉 陈登才
副主编 沈丹英 呼延南

目 录

陈延年的故事.....	1
古城英才.....	1
上下求索.....	6
“小列宁”.....	12
开疆辟土.....	17
军中铁魂.....	21
“车伕老陈”.....	25
“不抬轿子!”.....	30
高风亮节.....	34
陈乔年的故事.....	40
追求真理.....	40
古都喋血.....	45
前仆后继.....	50
阮啸仙的故事.....	57
发愤读书.....	58

学运领袖	62
青年先锋	65
指导农运	68
血祭青山	71
熊雄的故事	76
少年壮志为国立	77
长剑倚天信手拿	79
一腔热血洒黄埔	83

陈延年的故事

陈延年(1898—1927)，安徽安庆人，陈独秀长子。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之一。1923年转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区委书记。1925年参加领导省港大罢工。1927年4月后，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英勇就义于龙华，时年二十九岁。

古城英才

万里长江，滚滚东流，就如一条奔腾的巨龙。千百年来，它永不停歇，奔流不息，哺育了大江两岸的灿烂文明，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风流人物。

长江东流，流入安徽，经过的第一个重要港口就是

安庆。

安庆位于长江北岸的一片丘陵高地，依山傍水，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城。

在安庆建城七百余年的历史，曾经有过灿烂辉煌和英勇悲壮的篇章。这座英雄的古城威名远扬。元朝末年，著名的红巾起义军在这里大破元军，夺取安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安庆作为太平军的重要基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英雄的太平军将士们在这里进行了四次英勇的保卫战。他们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革命精神，一直在人们中间广为传颂。从1662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将近三百年间，安庆一直是安徽省的省会。

这片物华天宝、钟灵毓秀的神奇土地，19世纪末年，又造就了一位闻名海内外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陈延年。

陈延年，又名遐延，化名林木、陈东，笔名年、人等，1898年出生于安庆市南水关旧居，祖籍安徽怀宁县。他的父亲，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

陈家世代书香。陈延年的祖父陈衍中，字豪五，优廪贡生，一生以教书为生，在1881年他的儿子陈独秀两岁时，因病去世。陈衍中病逝后，陈独秀便过继给叔

父陈衍庶为嗣子。陈衍庶，字昔凡，清光绪元年的恩科举人，曾在奉天（今辽宁省）做官，还是安庆著名的国画家之一。陈氏家族原本贫寒，陈昔凡做官之后，家境逐渐富裕，但封建礼教甚严。陈独秀长大后，由母亲作主，与霍丘县副将高登科的长女高晓岚结婚。高氏共生子女五人：延年居长，二妹玉莹，三弟乔年，四妹早夭，五弟松年。

陈延年来到人世的时候，中华民族正面临亡国灭种的苦难深渊。父亲陈独秀年轻时即接受西方民主主义的影响，背叛了自己的封建家庭，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家时间甚少，而母亲高氏长期受封建家庭熏陶，从未受过现代文化教育，夫妻之间感情很不融洽。1910年，陈独秀与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热爱文学、思想趋新的小姨高君曼同居。家庭生活的不幸，给延年的幼小心灵投下了重重阴影，同时，也促使童年的延年更早更多地探讨社会和人生的真谛，激励他发愤向上的求知欲望。

延年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主要是在故乡安庆度过的。6岁时，延年入私塾读书。他自幼天资聪颖，尊师好学，喜博览群书，而且记忆力极强，凡先生指定的书，他都很快就背得烂熟，师友们都常夸他能“过目成诵”。他经常想方设法找书来读。当时，他们的邻居中有一个名叫汪洋的老先生，家中藏书很多，延年就经常到他家去

借。几年下来，他就读了许多经史典籍，并且写得一手好文章。私塾老先生看过他的文章后，慨叹说：“可惜现在科举废了，不然，延年将来定能进翰林院”。12岁起，延年先后就读于安庆尚志小学和全皖中学，接触到了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眼界为之大开，思想为之一振。

这时候，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前夜，延年的幼小心灵也受到了革命风暴的洗礼。1907—1908年之间，安庆发生了两次反抗清朝的革命。一次是1907年7月6日，革命党人徐锡麟率巡警学堂学生起义，击毙安徽巡抚恩铭，攻占军械所，激战四小时，后失败被俘，当晚英勇就义；一次是1908年11月，熊成基乘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的机会，率部起义，进攻安庆北门，激战一昼夜而失败。这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极大地震撼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给少年延年留下了深刻印象。

上学期间，陈延年阅读了许多中国历史典籍，从历史上的英烈传记中受到极大的启迪和教育，特别是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爱国壮举，深深地激励着这个少年的心灵。与此同时，延年还经常到迎江寺等风景名胜游玩，祖国的壮美河山和家乡的秀丽景色，无时无刻地陶冶着他的爱国情操。曾是革命党人的迎江寺主持月霞和尚，经常给延年谈古论今，品评人物，使延年受到不少启发。元末红巾起义军大破元军，攻占安庆的胜

利号角，经常在延年的耳际回荡；太平天国英雄们与清军浴血奋战，誓死保卫安庆的悲壮场面，时时在延年的眼前浮现。爱国志士们抛头颅，洒热血，一往无前的英雄事迹，使延年感动得多少次留下了激动的泪。他决心以他们为榜样，不怕杀头坐牢，不惜流血牺牲，做一番改造社会，造福人民的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

自古雄才多磨难。1913年，陈延年，这个15岁的少年就受到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

这一年，窃据中华民国总统宝座的袁世凯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反动措施。他先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接着又非法签订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继而又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并派兵南下。国民党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在这次战役中，陈独秀协助柏文蔚讨袁。后来在袁军的大举进攻下，“二次革命”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在安徽的爪牙派兵捉拿陈独秀和他的父亲陈昔凡。当时，陈昔凡已病逝，陈独秀出逃。穷凶极恶的反动派捉不到陈独秀，就派兵逮捕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准备斩草除根。多亏有人报信，延年和乔年从祖父的灵柩边溜出后门，连夜跑到乡下躲避，才免遭毒手。

这一事件，使延年亲身体会到反动军阀的残暴，加深了对黑暗势力的仇恨，从而更加坚定地走上了救国

救民的探索之路。

上 下 求 索

1915年，陈独秀暂时结束了在日本的逃亡生活，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为《新青年》）。不久，他把延年、乔年兄弟接到上海继续求学。于是，17岁的延年告别了故乡，和弟弟乔年一起，踏上了新的求学之路。

初到上海，延年与弟弟乔年和父亲同住在法租界吉益里21号。1917年初，陈独秀应聘赴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延年便和弟弟过起了独立的生活。

在上海求学期间，延年和弟弟乔年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尤其是父亲到北京工作后，他们的生活就更加艰苦了。陈独秀赴京前，曾委托亚东图书馆从他的稿费中每月支付十元钱给延年兄弟作生活费。这十元钱除了交学费及购买必备的书籍和文具，就剩得很少了。为了维持生活，延年和弟弟乔年只好一面上学，一面做工。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寄宿在位于上海四马路亚东图书馆的《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地板上，白天到外面去工作，和工人一起劳动，吃的是粗面饼子，喝的是自来水，冬天还穿着夹衣，夏天从来不打伞。由于经常劳作，风吹日晒，延年兄弟显得面容枯槁憔悴，很多人见

了都觉得心疼，甚至埋怨陈独秀也太狠心了。

延年的同乡潘赞化曾经十分具体地描述过当时在街上遇到延年的情景：那是一个寒冬的夜晚，海上北风大作，气候寒冷，路旁电灯昏蒙不明。只见远处一团寒气向他移来，到跟前一看，才知道是延年。只见延年一身寒雾笼罩，简直就象一只沙漠里的羔羊。潘赞化十分心疼地用手抚摸延年的肩背，不禁大吃一惊——延年仍然穿着夹衣，还没有穿棉衣呢。

本来，延年兄弟的生活完全可以过得舒适一些。他们的祖母家业很大，在安徽、东北、北京、上海都有产业、进项颇丰。老太太也特别疼爱他们的孙儿，总想多给他们一点。尤其是每年到上海清查她经营的金铺账目时，老太太总要派人四处寻找延年兄弟。当她见到两个孙子衣着破旧，面容憔悴时，十分疼惜，不禁潸然泪下。她责怪独秀没有照顾好自已的孙子，并当即要给延年兄弟添置衣物用具，并提出以后由家里汇款供他们上学，但延年兄弟却谢绝了祖母的好意。

当时和陈独秀在一起生活的小姨高君曼也很关心延年兄弟，曾经多次提出要让他们在家吃住。但她不懂延年的心。

陈延年是个有志气的青年。他早就下了决心，要“自创前程”，他要通过艰苦生活，来磨练自己的意志，砥砺自己的品格。他的志向，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和鼓

励。高君曼曾力劝陈独秀让延年兄弟在家吃住，陈独秀总是不以为然。高君曼为此多次与陈独秀争吵无效，便请潘赞化劝陈独秀。陈独秀对潘赞化说：“妇人之仁，徒贼弟子，虽是善意，发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陈延年在上海一边求学，一边工作，艰苦的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和品格，他的学习成绩不仅没有因为工作而受影响，反而因为刻苦努力而突飞猛进。他和弟弟乔年先是入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班学习法语。他们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呼吸着现代文明的新鲜空气，刻苦钻研，勤奋学习，法语水平提高很快。陈独秀的好朋友吴虞在1917年1月的日记中写道：陈独秀长子“法文极佳”。1917年，延年兄弟双双考入上海法租界的震旦大学。

陈延年在上海期间，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逐渐在全国蓬勃展开，各种各样的新学说、新思潮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来，各种新书刊也先后应运而生。怀着改变社会现状，寻找光明道路，探求革命真理的急切愿望，陈延年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新书刊，研究各种新思潮。其中，他读的最多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如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翻译的《天义报》、《新世纪》等，同时，还直接阅读了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的法文版原著，延年尤其崇信克

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还先后结识了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黄凌霜、郑佩刚等人，参加了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活动。

为了实现改造旧社会，创立新世界的宏伟理想，陈延年于1919年1月，和黄凌霜、陈佩刚等人在上海组织了进化社，创办了《进化》杂志。进化社标榜的宗旨是“介绍科学真理，传播人道主义”，其实主要是介绍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主张。陈延年担任该杂志的主编。他以“人”的笔名，先后在《进化》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编辑余话》和题为《为什么我们要发刊“恢复纪念号”？》的长篇专论。在这些文章中，陈延年充分表现了一个热血青年立志改造黑暗社会，不惜牺牲一切的革命热情，同时也暴露了他热衷于无政府主义，在探求真理过程中的思想不成熟性。他一方面尖锐地抨击了协约国帝国主义强盗和中国军阀的反动统治，号召人们起来“拿一副极坚强的奋斗精神”反抗“恶社会”，强调革命必须“排患御困，勇往直前”，即使“进了黑屋子（监狱），上了断头台”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他推崇无政府主义学说，驳难各种批评无政府主义的议论，并对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表示不满。陈延年虽然思想认识上尚未成熟，但他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所以，他在文章中还无情地斥责了某些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党人以“主义”为幌子，走

私钻营，谋官发财的可耻行径。由于军阀政府的查禁，《进化》杂志仅出三期，便于1919年5月被迫停刊。在恶劣的环境中，陈延年担当起处理善后的工作，并负责照料被捕同伴的家属。

1919年5月，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陈延年，这个满怀爱国热情的热血青年，坚决支持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盛赞“这次学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之意义，千古未有”。父亲陈独秀在北京因参加“五四”运动而被捕，有人问陈延年：“你有无恐怖？”陈延年慷慨激昂地回答：“既作不怕，怕则不作”！他说：在革命斗争“空前复杂的情况下，危险乃意中事，亦份内事，志士仁人，求此机会作光荣牺牲而不得，有何恐怖之可言？”

“五四”运动后，国内许多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都齐集于上海。陈延年和弟弟乔年等便在戴季陶等人主办的《建设日报》社协助工作，从事新文化宣传。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全国逐渐展开。这个运动的倡导者提出的“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深深地吸引着大批有志学习而家境贫寒的青年。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继续寻求革命真理，陈延年决定和弟弟乔年一起赴法勤工俭学。他们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的吴稚晖与陈独秀是挚友，又

与延年同为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成员，对延年兄弟有所了解，颇为器重，于是极力向勤工俭学机构推荐延年兄弟。他为此特地给上海华法教育会的沈仲俊连连去信，称赞延年兄弟说：“陈(延年)先生昆仲为陈独秀先生之令嗣，志行为弟等所敬佩”，希望沈仲俊帮助延年兄弟等筹措旅费，寻找船位。同时，吴稚晖又致函法国同仁，请他们给陈延年等人“以友谊的招待”。

1920年1月，陈延年兄弟等又一批赴法留学的青年，迎着凛冽的寒风，在黄埔江畔登上了一艘开往法国的邮船，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得港至马赛，上岸后再转乘火车，于2月3日抵达法国的首都巴黎。

到巴黎后，陈延年进入巴黎大学附设的阿里雍斯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根据学生的文化程度编班，教员多由巴黎大学的教授兼任，每天上课四小时，所学课程有文学、历史、地理和法国文明史等。求学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当时巴黎的物价很高，生活费昂贵。学费每季收二百五十法郎，一间房子的月租界要花去一百二十法郎。为了节省开支，延年和弟弟乔年合住一间房子，并利用房内原有的煤气炉自己做饭。陈延年十分珍视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他认真听课，按时完成作业，还充分利用学校的有利条件，经常到图书馆博览群书。他决心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学完规定的课程，然后投考

巴黎大学，但由于后来华法教育会停止对勤工俭学学生的资助，陈延年无法筹集学费以继续在巴黎的学业，不得不另谋生路。他经常到里昂去寻找机会作工，挣点钱再回巴黎，抓紧时间刻苦自学，环境十分艰难。

“小 列 宁”

然而，艰苦的生活，并没有丝毫动摇陈延年探求革命真理，改造黑暗社会的信心和决心。

初到巴黎时，陈延年继续与国内外的无政府主义者联系，参与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活动。他曾编辑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工余》，并与法国早期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大师格拉儒常有往来。但是当他看到一些留法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华法教育会中的无政府主义“同志”只会夸夸其谈而不刻苦学习时，便产生了反感情绪，认为他们“大都无头脑”，对科学“似乎一无所知，一无所研究”。尤其是在巴黎期间，陈延年逐步接触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而在法国有相当势力的无政府主义不仅没有对改造法国社会起任何积极作用，却越来越堕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这一切，都使陈延年对无政府主义感到失望。正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说：“到海外来，耳所闻，目所见，更有令人失望者。”